

从目录学的致用性看当代目录学的发展

王 锰 郑建明

摘 要 当代目录学的发展面临着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在当代如何发展,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如何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问题。中国目录学研究至今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该文首先对目录概念的古今和东西方差异进行了分析,接着从目录学发展的阶段性、中西方目录学的比较和目录学发展的致用性本质三个方面探讨了目录学在当代发展的问题。最后指出目录学技术化和知识化的趋势明显,在此背景下,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也要重建。

关键词 致用性 学科发展阶段性 中西比较 理论体系 当代目录学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ity

Wang Meng, Zheng Jianming

Abstract How to develop the essence of ancient bibliography studies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how to integrate classic theories with current practices ar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by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studies. Chinese bibliography research has not formed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in line with today's development. Under such a contex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oncepts of "bibliography"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bibliograph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development stag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bibliographic studies, and its practicality. It finally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revising the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theoretic system, considering the increase of technical components of the studies.

Key words Practicality, Development stage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oretical system,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studies

当代目录学的发展似乎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在当代如何发展,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如何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MARC、书目数据库、搜索引擎、网络目录、OPAC、计量学、元数据、云、排行榜、名人博客、微书评等有关目录学的新概念、新名词频频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代性和致用性,但由于没有对传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理论进行总结和升华,目录学的很多内容或者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或者是被划入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我国目录学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具有独具特色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目

录学研究成果的剧减,目录学教育的萎缩,目录学研究受到极大地冲击和挑战,目录学发展遭遇危机,这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目录学在当代的优势和发展进路。

1 目录的概念辨析

概念问题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概念的差别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于其内涵和功用认识的错觉。作为目录学理论中的“概念”,需要有明确的定义,不同概念的名称,不能同时使用同一个名词,对其内涵和外延也要进行限定。目录的概念古代和当代是有差别的。古代的“目录”中“目”和“录”各有其意,“目”的意思是书名或篇目,指文献的形式特征,相

当于现在的书目；而“录”是指序录或提要，是关于文献的内容特征^[1]，包括文献内容的学术流派及其演变、学术派别及其渊源，作者生平、学术思想、校勘经过、评价等的文字说明。正因为有录，所以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均以对学术的考辨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现在对于目录的理解基本是“书目”的概念，当代的目录实践实际是书目实践，大多数只有目而没有录，但只有录才能体现出学科的价值性和实用性。由于古今的差异，造成了目录与书目概念的混同，影响了人们对其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也影响了人们对目录功用的评价。又由于西学翻译中，对“目录”一指一个图书馆的书目，“书目”一范围大于一馆的书目的翻译，造成了书目与目录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3]。由此可以看到，中西、古今目录及书目的概念交叉导致了目录、书目概念的混乱，而关系的混乱会导致人们对其不能客观准确的评价，这在实践中可能不利于学科发展。因此，在目录学理论、实践和目录学教育中，应该对“目录”和“书目”的使用有明确的规范。

2 目录学发展问题探讨

2.1 从目录学发展的阶段性探讨

(1) 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20世纪40年代以前，目录学研究主要是以图书、目录和读者等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作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著录、编排、组织、书目情报、书目资源管理等。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但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文献。20世纪40-50年代，目录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献工作或文献学，如文献分类、编目、目录编撰、文摘、索引理论与方法等。这一时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都以文献为基础展开，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文献的概念、类型与范围也在不断拓展。^[4]目录学对文献规律和文献加工整理的研究被视为目录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2) 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20世纪80年代目录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文献转向信息。

目录学研究对象从文献转向信息也是目录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是其在信息环境下外延的扩展。目录学理论在网络信息组织中的运用成为目录学界新的关注点。这一时期，有关书目信息、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组织与服务、信息组织、搜索引擎、自动编目、自动文摘、自动索引、机读目录、书目数据库、联机编目等的研究日益丰富。

(3) 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兴起，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知理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背景下，目录工作和目录学学科体系建设也开始以知识为核心，目录、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使命转移到有效组织、揭示、报导、查找、传递与利用知识上。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又一次变革，使其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早期，目录学研究以文献为基础而展开，把目录工作的对象和基础，把读者的知识需求认为是文献或文献信息。然而文献作为记录知识的载体，只是记录知识发现、生产、加工、存储、传播与利用等知识活动过程与结果的物质载体、工具，但蕴含在文献中的知识才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目录形态由文献目录转向信息目录、数字目录、网络目录，这是目录工作的外延随着信息和知识载体的扩展而增大，但是随着读者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提高，目录工作无法将知识与载体有效分离，无法定位载体中的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时^[5]，对于文献的揭示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而知识管理的兴起，促使目录工作向知识目录和综合目录的发展，部分解决了此问题。这也证明了目录工作的对象和基础是知识，而不是文献，知识是图书馆活动和目录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目录的本质是对知识进行揭示和组织，是一种揭示和报导知识的工具。在网络时代，目录学不仅没有过时，目录学的研究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扩大，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频频出现。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目录学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文献整理，需朝着科学化与整体化、普及化与实用化的方向发展，以帮助人们快捷地获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6]可以肯定的是，目

录学的研究内容越面向社会,也越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每一个人。

2.2 从中西目录学的比较探讨

中国目录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7]“目录”一词始于汉代,西汉刘向、刘歆在整理官府藏书时,编成了反映先秦至西汉文化概貌的《别录》、《七略》,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的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宋郑樵《通志·校讎略》中提出的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泛释无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人类书等观点,为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章学诚《校讎通义》强调目录学作用不仅在部次甲乙,取便稽检,更注重条别学术的渊源流别。他提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并形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

西方目录学以图书的抄写和图书的描述作为目录学研究的起点。19世纪以前,西方的书目基本上都是列举式书目(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也称作系统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其使命在于提供完整的信息。分析目录学或评论目录学,是以积累学术文化信息为主,在西方被称之为目录学的科学方面。分析目录学与列举目录学有本质的区别:研究对象方面,前者以文献的物质存在为研究对象,而后者以文献的精神存在为研究对象;在其研究目的上,前者旨在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而后者则旨在将关于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辑物。^[8]但是西方目录学更偏重技术传统。西方目录学循着以图书为对象,以关于图书的描述为核心,以方便检索为目的的思想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和发展特色。信息技术在西方目录学领域的运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编目工作面貌,而且使技术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信息书目控制提上日程,应用技术对海量信息组织和检索,把无序的信息转换为有序的信息,以便高效率地使用,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英美分析目录学与我国校讎学有相似之处:校讎学起于汉代典籍的整理,分析目录学则起

于莎士比亚戏剧文献的整理;校讎学集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于一体,并进而演化出一些相关学科;分析目录学则融合了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并进而演化出一些相关学科。两者也存在着相异之处:中国校讎学长期与版本、校勘、目录等混杂不清,而分析目录学则起初就与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诸学有明显的分途;在中国是先有校讎学,然后才有目录学,而在英美则是先有列举目录学,然后才有分析目录学。英美分析目录学与列举目录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英美目录学的学科体系。

当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目录学继续发展,目录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相反,我国传统的目录学不仅不是目录学的主体,其地位还受到质疑。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方学术文化讲求主客体的区别,把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自然与人的科学理论,重科学方法,重视对外在真理的探索 and 知识的追求,讲究理性认识、逻辑分析、建立理论体系。^[9]故此,西方目录学很早就有目录学名词的词源研究和探讨,注意对目录学重要概念、范畴的严密阐述和定义,重视目录方法的深入研究和目录活动分科分类型发展。相对于我国传统目录学与校讎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彼此交叉难分的现象,这对目录学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致用与变通。西方目录学一直有致用的优良传统,其研究的问题均是书目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西方目录学研究成果对目录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西方目录学还保持着变通的优良传统,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设想,而不固步自封。正因如此,西方目录学技术才获得飞速发展,目录学才真正成为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传统目录学则注重保存文献和学术研究,受众面窄,是“学者的目录学”,这不同于西方目录学重视文献信息的利用和书目的检索功能,是“读者的目录学”。^[10]

可见,树立“大目录观”及“大目录学观”是必要的。“大目录观”及“大目录学观”的实质是目录学著录揭示对象的扩展及目录成果的多样化,即目录学的发展更加社会化、大众化及通

俗化^[11]。目录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主流之中，才有生命力，才能有发展。一方面，借鉴西方目录学发展经验，高度重视目录技术方法的研究，尤其是要重视研究信息技术在目录工作中的应用和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传播。因为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科学研究和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将网络环境下的书目工作作为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应该发扬和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点^[12]，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全面总结目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目录学著录揭示对象的扩展及目录成果的多样化，即目录学的发展更加社会化、大众化及通俗化^[13]。同时积极探索多元的目录服务模式，丰富目录学的服务内涵，提升目录学的社会效益，使我国的目录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3 从目录学的致用性探讨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本质和生命线。不管是传统目录学的深厚积淀，还是现代目录学的继承应用，目录学无处不在。传统目录学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指导读者治学，再到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都与时代相融合^[14]。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功能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化，从整理文献到揭示文献，从内容整序到治学门径，其思想直到现在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成为目录学的精髓。

在当今的网络文化背景下，知识记录载体经历了由传统纸质到电子化的变迁，纸质型的目录工具越来越少，书目数据电子化趋势加剧，书目数据传递、获取通过网络即可实现。但网络信息的开发利用与目录学仍有很多相通点，仍然离不开传统目录学，传统目录学依然是其坚强的基石^[15]。比如网络信息资源分布在各个网站上，以超大硬盘、服务器等载体存储，表现为数字化信息、信息资源或数据库，然而网上信息急剧增长，查找相关信息越来越困难。这就需要越来越多各具特色的搜索引擎、网络资源目录、导航目录等二次目录组织工具。网络组织工具是网络环境下目录的新形式，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目录工作中的应用。可以说传统的认知在新技术条件下并没有过时，其本质、工作原理、方式、信息排序原理等是目录学理论、方法的精髓内容^[16]，没有必要因为新型的

技术形式和表现手段而去改变传统概念的核心内涵，更不需要创造新的概念名词，这也是我们认识、理解、发展新的理论、技术、实践的根本所在，这样我们才能对目录学有一个科学而规范的认识。目录工作依然是目录学的基点，目录工作所要做的事情依然是“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以网络信息的揭示为例。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巨大，良莠不分，人们查找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困难，如何把传统的书目情报产品网络化，使其适应网络环境的需要；如何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揭示、深层开发，提供灵活多样的检索途径是新时代目录学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将目录控制的原理、手段、方法应用到网络信息资源的控制，将网络技术与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将优秀的传统书目方法融合到现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组织理论中去，中国当代目录学的技术发展要在吸收解题、互著、别裁等传统书目工作优良方法的前提下，不断应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新检索技术，对庞大的信息进行组织整理。诸如各种书目数据库、网络目录、相关的搜索引擎等，与元数据、数据挖掘、在线翻译、叙述、控制词表、多重版本、主题分析等方法技术相结合，促进目录学致用性与技术性的融合与衔接。目录学的致用性与现代书目技术的结合为其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当代目录学从致用化原则出发，以目录实践来标示新时期的目录学思想内涵，自觉地承担起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网络信息资源的职责，对无序化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揭示，会为社会提供更为完善和便捷的目录服务。

3 结束语

目录学以其致用性本质在新时期将继续发展。目录学发展正是处于技术快速发展和知识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背景之中，目录学技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并且两者正在快速地融合为一体，成为推动目录学发展的巨大力量。所以说，技术化和知识化是当代目录学发展的两大明显的特征，技术化是知识化的基础，知识化是技术化发展的必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说，目录学界更关注目录学的技术特征，忽视了目录学

(下转第41页)

推荐比例达到了 76%，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总结

上海图书馆新书推荐系统的外围架构包括放置于我的图书馆个性化读者服务门户的用户界面已经后台的数据采集和存储的数据仓库。读者登录“我的图书馆”后可在相应栏目中看到针对其外借图书历史数据分析得到的近 3 个月新书推荐，既考虑了读者隐私，又实现了个性化的新书推荐。

本文设计实现的个性化新书推荐系统考虑了多种应用场景，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读者信息需求进行数据分析与挖掘，有效地提高了新书推荐个性化与准确性的统计。但由于考虑到用户实际使用我的图书馆网站的情况以及系统产生矩阵承受的压力，推荐表采用离线生成的模式，实时性不够。此外今后还可考虑引入话题模型，提高推荐表的时代感；记录并分析读者的浏览、检索历史等行为，丰富数据基础。

参考文献

- [1] Information overload[EB/OL]. [2013-03-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_overload.
- [2] 郭家义.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中用户信息行为的收集与分析[J]. 图书馆杂志, 2003, 22(1):25-27.
- [3] Kathryn Zickuhr, Lee Rainie, Kristen Purcell.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EB/OL].[2013-02-14]. <http://libraries.pewinternet.org/2013/01/22/Library-services/>.
- [4] 项亮. 推荐系统实践[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 [5] Schafer J Ben, Joseph A Konstan, John Riedi. Recommender systems in e-commerce[C]. Proceedings of 1st ACM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9:158-166.

杨 佳 女, 1982 -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09级在职研究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工程师。 上海 200031

(收稿日期: 2013-09-18 编发: 郭 晶 孙 翌)

(上接第17页)

的知识特征。随着目录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当代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也表明“目录学”传

统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已不能完全涵盖其新的内容, 需要构建新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以使这门学科更合理, 使其发展前景更辉煌。

参考文献

- [1] 张志强. 文献学引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0:132-133.
- [2] 韩松涛. 网上学科导航的目录学特性初探[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4):76-80, 104.
- [3] 韩松涛. 目录学基本理论探讨[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9):40-42.
- [4] 刘晓英, 叶文青, 文庭孝. 知识地图学——论现代目录学的本质[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7(3):336-341.
- [5] 陈传夫, 丁宁. 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与功能延伸[J]. 图书情报知识, 2008(6):56-59.
- [6] 王子舟. 时代需求与目录学的发展[J]. 图书情报知识, 1998(1):7-10.
- [7]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7.
- [8] 王京山. 英美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1):30-35.
- [9] 柯平. 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152-170.
- [10] 袁生奎. 中西目录学沿革及学术风格研究[J]. 情报杂志, 1998(4):10-12.

- [11] 彭斐章, 陈红艳. 数字时代再谈目录学知识的普及[J]. 图书馆论坛, 2007(6):9-12.
- [12] 肖希明. 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 1994(5):1-5, 61.
- [13] 夏南强, 张炯. 当代社会需要的目录学[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5):66-68.
- [14] 彭斐章, 付先华.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J]. 图书馆论坛, 2004(6):5-10, 57.
- [15] 付先华. 当代中国目录学的新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5):70-73, 81.
- [16] 彭斐章, 盛钊. 学科环境的变化与目录学变革路径[J]. 图书情报知识, 2008(6):51-55.

王 锰 1989-,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11级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3
郑建明 1960-,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教授, 博导。 南京 210093

(收稿日期: 2013-04-15 编发: 许桂菊)